

王杰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赞歌

□ 余建坤 陈奋苗

60年前的7月14日，为了保护参加训练的同伴，一位年轻的战士扑向即将意外爆炸的炸药包，用生命谱写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赞歌。这位战士名叫王杰。

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王杰生前所在连官兵，在详细了解王杰的事迹后，他感慨地说：“我小时候就知道王杰的故事，王杰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2019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王杰班”全体战士回信，勉励他们“弘扬王杰精神，努力拼搏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政治的高度，明确提出“王杰精神”的概念，深刻阐明王杰精神的特殊地位和时代要求，为学习践行王杰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

王杰1942年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生前系原济南军区坦克第二师工兵营一连五班班长。王杰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小爱看英雄画册，听老一辈讲“黄继光堵枪眼”等英雄故事，内心充满了从军报国的向往。1961年8月，王杰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应征入伍。入伍后，他很快加入了共青团，并连续3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1965年7月14日清晨，王杰在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组织民兵地雷班进行实爆训练时，由于拉火管失效瞬间发生自燃，在炸药包即将爆炸的0.7秒反应时间里，作为一级技术能手的王杰，没有选择用后仰来保全自己，而是奋不顾身扑向炸点，保护了现场的

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却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年轻的23岁。同年11月6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向王杰同志学习，向全国全军提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要求，从此，王杰的名字在神州大地上广为传颂，成为人们心中一座永恒的丰碑。

王杰精神内涵丰富、意蕴深厚，以“人生三问”“两不怕”“三不伸手”为内核，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精神元素有着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对于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涵养官德人品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王杰参军4年间，先后写下352篇、总计10余万字的日记。今天，我们仍可以在这些字里行间了解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对信仰、信念、勇敢、意志和气节的思考认识，探寻王杰精神的内核密码。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信仰的坚定源于理论的清醒。王杰在生死关头的奋力一扑，并不是一时偶然，更不是瞬间冲动，而是日积月累的理论积淀、思想改造和灵魂升华的壮丽迸发。王杰一直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第一笔津贴就购买了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夜以继日地学习，他经常深夜躲在被窝里，用自制的电池灯看书写笔记，为了鞭策自己，还用鲜血写下了“大学毛著”的血书，牺牲前一晚仍在发奋研读《矛盾

论》。打开王杰的日记本，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是“反反复复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如饥似渴学毛泽东著作，为王杰的思想提升拓宽了一片新天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一遇到问题就到毛泽东著作中找思路、解难题，最终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1964年7月28日，王杰在日记中写下了拷问灵魂的“人生三问”，这是一种扪心自问，也是一种反躬自省，更是一种对个人灵魂的净化之问，生动诠释了王杰的高尚情操。

“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王杰从小热爱革命英雄，在他的日记里，8处提到黄继光，6处提到董存瑞，33处提到雷锋，还有方志敏、刘胡兰、张思德、邱少云等革命先烈。正是追寻着英雄的足迹，王杰形成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并主动抢最艰苦的岗位和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去做。海河抗洪抢险，他跳进洪水里抢运木材，身上被铁丝网划开条条血口；工兵架桥训练，他跳进寒冷刺骨的冰水中打桩架桥；沂蒙山施工中出现哑炮，他第一个冲在最前面排除……1965年，美国出兵越南，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5月1日，王杰在部队的战备动员会后，扎破手指写下血书，表达自己保卫祖国、援越抗美的坚定决心，并在日记中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短短两个月后，面对即将

爆炸的炸药包，王杰毅然伸开双臂，扑向即将引爆的炸点，毫不犹豫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立下的铮铮誓言。

“牢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王杰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危急时刻的英雄壮举，还有面对挫折、荣誉、危险时表现出的高尚情操。他一心向党，先后向连队党支部递交过14封入党申请书，可由于出身中农家庭，始终未能如愿。有战友曾经问他：“你年年是好战士，立过两次三等功，为啥还没入党呢？”这些问题起初也一度让王杰情绪低落，读了《矛盾论》后，他明白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自己还是有为入党而入党的想法，还是要从自身找原因，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1964年3月13日，王杰在日记中写道：“入党这是我的要求，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别人能入党这说明别人条件已经具备，自己还不具备，还有的工作没做到家……今后加强学习，争取做个党员。”他还在连队组织的“思想汇报会”上向党支部郑重承诺：“自己要‘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并请求连首长和战友们对他进行严格监督和经常提醒。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王杰生前所在连荣誉室时，看到王杰正确对待荣誉和进步的展板，深有感触地说：“这‘三不伸手’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要好好对照这面镜子。”

（作者分别系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大校部队长、大校政治委员）

精神丰碑

《大众日报》：一张报纸的抗战

□ 孙士生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1939年1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主办的第一张党报《大众日报》创刊。《大众日报》从蒙山深处的沂水王庄出发，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转战百余个村庄，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条件如何艰苦，坚持出版发行，成为一面不倒的旗帜和一只永远吹响的号角，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张从未中断出版的党报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山东各级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全省燃起抗日烽火，组建了数十支抗日游击队。1938年5月21日，奉命到达山东的新任省委书记郭洪涛，在泰安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把创办一张全省性报纸列为创建根据地的三大任务之一。郭洪涛委托刘导生、匡亚明负责报纸筹办。克服人、财、物各种困难，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在蒙山深处的王庄诞生，报纸初期为三日刊（后来过渡到二日刊和日刊），四版铅印，创刊初期每期印刷1000份。发刊词明确提出《大众日报》的使命是发表一切有益于抗战的言论。1940年1月1日，创刊一周年之际，《大众日报》特刊刊登了毛泽东专门为《大众日报》的题词，要求动员报纸等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给浴血奋战的山东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大众日报》在艰难困苦的抗日环境中一直坚持出版。大众报人既是办报队，也是战斗队。在1939年6月鲁南反“扫荡”战斗中，报社营业室工作人员赵钧不幸遇难，成为《大众日报》创刊后牺牲的第一位同志。1941年冬大青山突围战中，战时第二新闻小组18位同志壮烈牺牲。1942年11月在沂水对崮峪一带突围时，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管委员会主任李竹如不幸牺牲，是报社史上职级最高的烈士。据统计，从创刊到新中国成立，累计有578名报社工

作人员和发行员，为《大众日报》的出版发行壮烈牺牲。

尽管在反“扫荡”中报社员工牺牲很大，生存困难，但大众报人始终牢记职责使命；战胜困难保证报纸出版，把延安的消息传出去！他们钻山洞挖地洞，与敌人在群山中周旋。没有油墨，就用马尾松烟子灰加上松香制成“土油墨”；没有印刷纸张，就从当地传统土造纸法中想办法，用桑树皮做原料制成几乎透明的“文化纸”。因特殊情况不能铅印时，就出石印、油印报或书页式小报。1939年8月到年底在离敌人据点十几里的“地屋子”出版石印版。从1941年11月14日到1942年1月24日，《大众日报》出版战时油印版15期，并能基本保持报纸原貌。1942年3月，报社转移中因印刷设备未随队迁移，在当地只找到一台八开机，报社就出版“战时版”即小号的《大众日报》，每版仅容1100字，他们字斟句酌，把最重要的信息发出去。当群众在极其艰难中看到党的报纸，了解到最新战况时，如同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从1939年10月至1943年11月，《大众日报》社陆续出刊《大众电讯》《记者生活》，建立大众通讯社、大众印书馆和山东新华书店等，逐渐发展成“多媒体”报社，形成了一支战胜敌人的“文化大军”。截至1949年4月1日由解放区农村迁至济南，《大众日报》连续出版2510期，从未中断。

建立战时发行体系

战争年代，如果说把党报比作军民的精神食粮，那么发行就是必不可少的“碗筷”。《大众日报》的基本户分为三部分：一是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根据地当地机关及周边地区党的机关；二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等军事单位；三是散户，这一部分主要是农村中有文化的教师、开明绅士等。由于部队流动性大，敌后环境艰苦，没有行业团体可资利用，《大众日报》只能自办发行。

创刊初期《大众日报》在沂水县

夏蔚镇王庄办公。这里地处沂蒙山区中心腹地，非常闭塞，交通一般都靠徒步，加上敌人的处处封锁，报纸的发行工作艰难而危险，主要靠我党的交通员徒步肩挑来完成。为安全起见，《大众日报》印刷厂安在离王庄七八里路的云头峪村，从编辑部到印刷厂往返底稿运报纸，都由交通员负责。报纸在沂水夏蔚总发行处分发后，交通员通常利用夜间翻山越岭，冒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把报纸发送到全省各代销处和订户。尽管如此，由于缺乏完善的发行系统，报纸积压丢失现象时有发生。山东分局为此决定在滨海、鲁中、鲁南、渤海、胶东等五个地委成立《大众日报》分社，各县设代销处，负责报刊发行，并以沂南为中心建立交通总站，开辟了数千里交通线。采取这些措施后，发行速度大为加快，新出的报纸3天就能看上。基层区村的订阅数量显著增加，报款及时收缴，改善了报社经营状况。

1942年2月7日，山东战时邮务总局在沂南县马牧池乡成立。作为山东省战工会的职能部门，对外称邮局，同时是党委交通科和报社发行部，将传递文件、护送干部和报纸发行结合起来，建立了“邮政、交通、发行”三位一体的战时工作体系。邮发合一使报纸的发行速度和发行数量大为提高，1944年6月《大众日报》发行量达到1.5万份，报纸两天就能送到订户手中。邮发合一的体制创新为新中国建立完善的邮政系统积累了成功经验。

充分发挥党报的战斗力和影响力

《大众日报》创刊后围绕党的中心工作，通过大量发表评论尤其是社论，宣传党的抗战路线，在统一思想认识、减租减息和做好群众工作等方面，发挥了党报舆论机关和指导实际工作的作用。

通过开展群众性读报活动，扩大《大众日报》的发行。1940年4月《大众日报》成立了读者会，开展读

报活动，以有文化的通讯员为核心，利用冬学、识字班、民兵夜校等向群众宣讲报纸上的重要内容。山东战时邮局职工提出了“争取每张党报能供10人阅读”的口号，从实际出发组织不同人群的读报小组，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为群众解疑释惑。部队打到哪里，报纸就发行到哪里，采取普遍赠阅和主动派送为主，逐渐过渡到自愿订阅。

武装交通队打破日伪封锁线。1942年日伪“五大扫荡”，全省敌据点密布有3000多个，交通线遭到破坏，滨海、鲁中、鲁南、渤海、胶东根据地被分割开来。战时邮局成立了武装交通队，护送往来干部、报刊和文件。武装交通队通常携带枪支昼伏夜行，穿过一个个据点，爬山渡河，任务完成后再趁天黑返回，经常步行上百里路，风雨无阻。他们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只要党报能出版，我们就能发出去”。《大众日报》还被送到延安图书馆，方便党中央及时了解山东的情况。交通员虎耀两次冒险往返山东到延安，出色完成任务，1945年被评为山东战时邮局英雄。因为从不中断出版，《大众日报》也成为周边根据地了解党的政策的窗口。

大力开展敌占区的发行工作。各战时邮局利用武工队、社会团体等多种发行渠道，建立固定对象、定期赠阅、自愿订阅的秘密发行网，开展了敌占区的发行工作，使报纸在敌占区的发行量翻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有的群众看了报纸后秘密地把慰劳品送给八路军，有的伪军看了报纸向八路军投诚，有的地主了解党的政策后主动减租减息。沂水县城的日军曾以100元一张购买《大众日报》搜集情报。各县武装发行组配合武工队把《大众日报》张贴在交通要道、十字路口和集市上，扩大了党报覆盖面和影响力。1943年6月山东战时邮局提出：“我们运往敌区的每一种宣传品，就好比埋在敌人心脏中的一颗炸弹，它是指导敌区人民斗争的指南，它是动摇瓦解伪军伪组织的有力武器。”

1953年9月，王有德出生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宁夏灵武市马家滩。开裂的盐碱地、迁徙的明沙梁、蜷缩的沙蒿根，成为他与黄沙一生搏斗的起点。这位将生命熔铸于治沙事业的英雄，面对“沙逼人退”的绝境，以无畏的勇气和磐石般的决心，开启了与风沙近半个世纪的鏖战。2000年，王有德担任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2018年，他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科学治沙的探路人”。

扎根：荒漠中萌发的绿色初心。毛乌素沙漠，横亘于陕蒙交界，曾是一片令人绝望的“死亡之海”。历史上因垦牧失度，生态崩坏，形成了4.22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区。生于斯、长于斯的王有德，年少时便饱尝风沙之苦，目睹黄沙灌满窑洞的凄惶。“从我记事起，沙子就一直在往家里扑。”与风沙共生的童年，将一颗誓要锁住沙龙、播撒绿色的种子，深深埋入他的心田。1976年，他投身林业系统。1985年，他挑起白芨滩林场副场长的重担，成为这片治沙主战场的领军人。白发滩，距黄河最近处仅5公里，总面积148万亩。这道屏障一旦失守，毛乌素沙漠西侵，滚滚流沙涌入黄河，河床抬升甚至断流的生态灾难将不堪设想。

初到林场，映入王有德眼帘的是黄沙漫天，是被沙丘围困的建筑物，是“风天进沙、雨天漏水”的生活空间，是“穷得连婚都结不了”的现实困境。如何绝地求生？他选择了最艰难的路——与职工同吃沙土饭，共睡地窝棚，一锹一锹推平沙丘，一步一印将草方格深深扎入流沙腹地。酷暑，顶着50多摄氏度的炙烤平整沙地、挥汗种树，夜晚蜷缩在沙窝的帐篷里；严冬，为抢抓树苗灌冬水的宝贵时机，日夜坚守在刺骨的水渠边。他带头改造危房，将“雨天漏水、冬天透风”的破屋改建为坚实的砖瓦房，更在场部垦出葡萄园和菜地，种出对生活的希望。“宁肯掉下十斤肉，不让生态落了后！”王有德与他的治沙队伍，以近乎悲壮的“掉肉”决心，用草方格、沙障和耐旱植物，在荒漠腹地筑起一道不屈的绿色长城，诠释着最质朴的坚守。

破局：改革激荡的生存智慧。然而，比肆虐的风沙更难驯服的，是涣散的人心。20世纪80年代的白芨滩林场，依赖捉襟见肘的财政拨款，职工收入微薄且无保障。王有德深知，仅凭“苦干”无法让林场真正活命，唯有打破体制坚冰，方能改革图存。他算了一笔账：财政拨款仅够糊口，而造林所需的苗木、工具、运输、吃住、治沙等巨额开支，几乎全靠林场自谋生路。于是，他提出“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思路，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作为行动准则。通过深入调研和反复测算，制定了清晰的劳动量化指标，推行工效挂钩、按劳计酬——多劳者多得、优绩者优酬。建立“定区域、定责任、定考核”的“三定”机制，千好千坏有标准，任务完成有核算，长期工作有合同。同时，他大胆鼓励职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人精育苗木，有人跑活运输，有人变沙为宝建建材，有人勇担护林重任……曾经荒凉的林场出现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创业画面。外人惊叹：“林场活过来了！”职工感慨：“干得再苦也有盼头！”历经多年改革探索，一套成熟的“六位一体”治沙模式逐渐成形：在外围建灌木固沙林，周边建乔灌防护林，内部建经果林、搞养殖业、种牧草、做沙漠旅游业，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区域内水土流失明显减少、植被覆盖有效增加，森林生态系统固碳释氧功能得以发挥，其每年产生的森林生态服务效益总功能价值达15.88亿元。而林果、苗木、蔬菜等支柱产业的发展，也让林场职工走上了增收致富之路。

传承：独木成林的精神星火。数十载光阴，王有德只专注一件事——治沙。起初是他带着一群人干，到后来，是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他干。有人说：“王有德的林场不是单位，是一所治沙大学。”也有人说：“跟着王有德干几年，心就定了；人一进林场，风沙吹不散志气。”在白芨滩的30多个春秋里，他亲手锻造了一支能征善战的治沙铁军——无数“土专家”“老把式”脱颖而出。他们熟悉风向、掌握造林密度、对各类沙丘的草方格参数如数家珍。这些人中，有的成长为场长、书记，有的远赴他乡开创新林

□ 王 琮

王有德：『科学治沙的探路人』

场，带出了一支又一支新的治沙队伍。治沙的技艺薪火相传，绿色的道路越拓越宽。

在职工心中，他既是干事的“主心骨”，又是并肩的“老伙计”。他少有豪言，更多的是用行动推着大家上、领着众人干。2003年起，他推动建立“宁夏青少年生态教育实践基地”，每年组织周边数千名学子、志愿者投身义务植树与治沙公益。他常说：“治沙，一个人、一个单位成不了气候，得靠大家接着干，一茬人接着一茬人干！”他在沙海种下的何止是树木，更是坚定的信念、宝贵的经验和生生不息的传承之路。三代白芨滩人，以愚公之志，累计治沙造林68万亩，驯服流沙近百万亩，构筑起一道南北绵延60公里、东西横亘40公里的绿色长城，成功将沙漠逼退20公里，有效遏制了其南移西扩的势头，牢牢守护了黄河母亲河的生态命脉，也为银川河东地区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高质量发展铸就了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不息：退而不休的治沙远征。2014年，王有德正式退休，告别了倾注半生心血的白芨滩。然而，仅仅隔日，他的身影便再次出现在熟悉的沙海边缘。这一次，他的目光投向了银川河东机场东侧的一片新战场——地势开阔、风疾沙涌，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风口浪尖”。他投身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金会工作，召集退休老同志、基层干部和社会志愿者，义无反顾地再次投身治沙事业。没有财政后盾，他便走上街头，印发传单，奔走呼号，动员社会力量。他率先捐出资积蓄，亲身携带募捐表，见人便诚恳宣讲。为了治沙，他干脆把办公室安在沙丘旁。条件依旧艰苦，桌上常备几十瓶淡盐水，随时迎接前来助阵的志愿者。他与年轻人同劳动，体力不支干不了重活时，就负责测量、设计、调配苗木。旁人劝他歇歇，他摆摆手：“铁锹拿不动了，还可以带着年轻人干。”

“绿水青山不是口号，是得下死力气干的硬活！”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此后的5年，他率领团队修复沙地1万余亩，栽下130多万株生命的希望，建成4000亩生机盎然的绿洲。当被问及为何如此拼命时，王有德平静作答：“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像我，一辈子就干了栽树治沙这么一件事，忙惯了，闲不下来。”只要黄沙未竟，他的脚步就不会停歇，始终认定：“治沙，是终生的事业。”

